

我的學思歷程

● 汪 暉

我這一代人跟現在年輕人走過的路恐怕很不同。過去不覺得，現在我已經帶過很多學生，慢慢意識到這個經歷非常不同，形成了明顯的代際區別。另外，在中國內地，我這一代人的成長，如果跟美國、歐洲、日本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，學者的道路也是非常不同的，要曲折複雜很多。學術思想有書為證，而這些經歷不說也就忘卻了。相比於談論學術研究的學思歷程，我更願意分享一點我的生活經歷，這些經歷也烙印在我的學思過程之中；若以後有機會，我再談談自己學術研究的一些脈絡。

一 學徒時代

我是揚州人，在揚州出生、長大、唸中學，整個過程都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。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期，與此後的時期、此前的時期相比，都非常不同；逐漸地，我認識到，在全球所有社會主義國家，包括如今我們稱之為前社會主義國家，比如蘇聯、東歐國家，都沒有經歷過文革或類似文革這樣的運動。中國有過這樣非常獨特的歷史，無論怎麼評估，在中國歷史上、世界範圍內，文革都是很重要的話題，而且爭議不斷。年輕一代對這段歷史已經很模糊也很淡漠了，這段歷史中有許多慘痛教訓是確實的，因此很多人以為全部的歷史評價都可以板上釘釘，但我覺得今天給它下論斷依舊太早。我這一代人是從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的。

我中學畢業的時候，高考還沒有恢復，這又是另外一個特點。文革期間有一件事——我這是說故事，不是說學術，學術可以看得見，這些故事看不見，

* 2025年3月20日，汪暉教授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以「我的學思歷程分享」為題，與師生對話。本文稿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生韓心雨依據現場錄音整理而成，經汪暉教授審閱定稿。

但要談論學思歷程，這些看不見的故事也許有意義，至於是甚麼樣的意義，我也並不是完全清楚的。1960年代文革爆發以後，毛澤東提出「學制要縮短，教育要革命」的口號。當時小學六年，中學六年，加起來十二年，他說要縮短；事實上後來縮短到最短的時候，小學五年，中學四年，計九年。我正好在過渡期，小學上了五年半，中學上了四年半，變成十年，這也有點特別。因為學制縮短，等我畢業的時候，我十六歲出頭，還不夠工作年齡，所以我做過臨時工，臨時工不需要簽訂勞動合同，也很少查核工作年齡，到1977年我年滿十八歲時，才正式分配到揚州無線電元件一廠當徒工。我當工人，時間不長，其實不到兩年——大約一年半的時間，可是我在三家工廠工作過，最後一家正式分配的工廠其實是我工作時間最短的。現在的學者可能已經沒有甚麼人有過這樣的經歷了，在內地我這一代人裏還是很多的。

我第一份臨時工是在揚州製罐廠打工，當時這家工廠也叫揚州蛋廠，一家做罐頭的工廠。我在裏面做甚麼？我做絞肉的工人，每天推一架鐵皮車到冷庫裏，把肉用鐵叉插到車裏，再拖去絞肉機攪拌，然後製罐，等等。我曾經有一篇文章回憶這個過程^①。攪拌過程要是偶爾有毛巾被攪進去了，又碰巧被檢驗出來了，那一批罐頭就會報廢，就會賣給我們。當時肉食是緊缺的，每人一個月大概半斤，所以我們能拿到報廢的罐頭是很幸運的。這份工作是我當工人時期工資最高的，一天一塊錢人民幣。我覺得那個時候，雖然總體是貧困的，但沒有不安全的感覺，這是整個社會的特徵。

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個紡織工廠擋車車間工作，當時的廠名叫揚州紡織廠。擋車工都是女工，我是一百多個女工當中唯一的男工，但我不擋車，我是打包工，所有擋車女工把擋完了的紗線送到我這裏，我就要用機器打包。我在揚州製罐廠的薪酬是按日計算的，在紡織廠是拿月工資，我記得是24元。

另外一位男工不常在車間裏，他是所謂保全工。說這些是因為我從跟我的學生的交流中，感覺伴隨着經濟變遷和市場發展，新一代人的生產知識很匱乏，他們吃的東西來自超市，不知道農作物在田裏長得是甚麼樣子，甚至農村出身的孩子也沒有多少農業生產的知識了。這是很真實的。我們那個時代每年都要下鄉勞動，做各種農活，所有的農作物都能辨認，這是一代人的經驗。同時我們去工廠勞動，從中學開始就會學工，我當過車工、鉗工、刨工，這些都是在學生時期就做過，等我中學畢業以後再做製罐，然後做打包工，這是另一個階段。大家知道當年的紡織工廠，機器



汪暉教授（圖片由韓心雨提供）

二十四小時不能停止運作，所以是三班倒——早班、中班、夜班這樣的過程，我也工作了一段時期。

後來年齡到了就正式分配工作，從徒工開始。當時無線電工廠生產軍用電話機和脈衝儀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上螺絲，上完了就交給別人，永遠是這樣，流水線的工作，這是最無聊的工作。因為是徒工，工資很低，起初是13元，到1978年春天離開工廠時，我的工資是16元。這份工作時間很短，因為上班不久很快就恢復高考了，但我的正式工作履歷是從這兒開始的，工齡也從此刻算起。我們工廠經常沒活幹，可是我要高考的時候工廠來了活，每天要加班，完全沒有時間複習。高考剛剛恢復的時候，大學有十年沒有招生，所以十年的學生都集中在這一年參加高考，而當時只有很少一部分高校恢復辦學，所以錄取率相當低。記得平均是4%多一點，現在已經超過80%。我所在中學那一屆一共有六個班，差不多三百人，錄取率不超過2%，應屆生考不過「老三屆」的，而這所中學是揚州最好的中學之一。這就是大致的一個狀況，一個時代性的特徵。

我最早就在我母親教書的地方唸書，揚州師範學院，現在的揚州大學。這所學校的文科有很長遠的歷史，也許學文學的應該知道，任半塘（1897-1991，也叫任中敏、任二北）當時在這所學校任教，他是全國為數極少的博士生導師之一。王國維研究領域中，《人間詞話》的有關研究，有一部名著是譚佛雛先生（1919-1997）寫的，他是我們文藝理論科目的老師。我自己的碩士導師是章石承先生（1910-1990），章先生是1930年代上海的一位詩人，也是作家，他早期是龍榆生先生（1902-1966）的弟子，所以他是學詞學的，後來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去唸書，可是唸書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，為抗議日本的入侵，他就回到中國，此後再也沒有回去過。抗戰期間，他的老師龍榆生因為詩詞因緣又跟汪精衛扯上關係。關於他的故事，我曾在他過世的時候在《讀書》雜誌上寫過文章。另外有一位徐沁君先生（1911-2001），他是中華書局《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》（1980）的校點者，這兩部大書是元曲研究非常重要的作品，是在文革期間住牛棚的時候，他在廢紙煙盒上逐漸寫成的。這些老師都跟近代中國的一段複雜曲折的歷史有關係，經歷非常特別。我跟徐沁君先生很熟，民國時期，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共青團，國民黨有一個青年黨，青年黨後來的黨魁叫陳啟天（1893-1984），徐沁君老師就是陳啟天的秘書，他1949年沒有去台灣，留在大陸，先在一所中學教書，後來就到了揚州師範學院。我的鄰居中還有許多這樣的老一代的學者。

我本科入學的時候十八歲，有位年長一些的同學的兒子大概十一歲，所以同學之間的代際會相差很大，這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我從大學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十年期間，一直處在比較小的年紀，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比我年長，而且他們的生活經歷很複雜，我的同學裏有公社書記、學校的教務長、退役軍人，各種各樣職業的人來上學，所以這一代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代。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。

這段經歷與我此後的學術研究有一點關係，尤其是魯迅研究。在我們上中學的時候，正值文革期間，當時很多書不讓讀，但魯迅的著作可以讀，《紅樓夢》可以讀，這是非常奇特的。1970年代，又有「評法批儒」運動，我們這一代人開始接觸中國古典思想大致從那時開始，雖然每人因為境遇和環境各有不同。為甚麼《紅樓夢》也可以讀？文革後期，我們聽說，毛澤東曾說要讀懂《紅樓夢》，至少要讀五遍。他把這部小說看成了封建時代及其矛盾、鬥爭的生動展現。但我後來讀《紅樓夢》，想到如果一個年輕人在文革期間讀《紅樓夢》五遍，不知道最後會變成甚麼樣了？

另外就是要讀魯迅，有意思的是我的小學當時曾改名叫魯迅小學，我的中學又曾改名叫魯迅中學，我母親當年教書的這所（後來也是我的母校）揚州師範學院，一度改名為魯迅大學，我好像跟魯迅還真是有緣分。讀他的著作對我來說，是認識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，不單是他的小說、散文、雜文，除了文學外，還有他的生活、思想和判斷的每一個方面。魯迅是一個內斂的天才，比如郭沫若是一個奔放的天才，魯迅是內斂的，但實際上他真的是才華橫溢；他的語言也是內斂的，但是裏面孕育了非常深刻的東西，要有一點閱歷和經歷才能讀懂。經歷過很重大的變化之後，我每一次重讀都會有一點不同的感覺。所以讀魯迅對我來說很重要。雖然我目前的研究重心不在魯迅，可是每隔一些年我都會再去翻看；每次重看，隨着我年齡的變化，都能讀出一些不同的東西，所以我偶爾也會寫，比如說我後來寫了《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》^②，也是因為給學生上課，需要講授魯迅作品的緣故。《阿Q正傳》是魯迅最知名的著作，那麼多人評論，可我後來再讀，發現我年輕的時候沒讀懂。我覺得絕大部分評論家也沒完全讀懂，這不是說別人都錯，而是你有一個自己的體會，一個重新的理解，因為阿Q這樣的人，他不像〈狂人日記〉的狂人、〈孤獨者〉的魏連殳、〈在酒樓上〉的呂緯甫這些人物，他們的身份和思想跟知識份子更接近，雖然魯迅寫得深刻，你還是容易理解這些人物。阿Q這樣一個人跟我們的生活完全沒有關係，所以你要理解他，其實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經驗，而且在一個大的歷史框架中才能把握。找到一個值得你一生反覆閱讀的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都是一種幸運，這是碰的，不是很容易碰到。

二 在爭論中學習：1980年代的研究生院

後來我到北京唸書，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院，跟隨唐弢先生（1913-1992）唸書，他是魯迅的弟子，我跟着他研究魯迅，這好像正統學術的一道脈絡，其實他對我的研究持完全開放和支持的態度。我在1980年代到北京唸書的時候，中國處在又一個巨大的變化當中。現在市面上很多作品回憶80年代，作為過來人，覺得大多數的回憶都是扭曲的，你怎麼看都覺得不太像。對歷史的理解，我覺得需要經過一個過程，而後才能理解到底甚麼是

歷史；對何為真實的理解也會完全不同，隨着時代的變化，隨着你自己的變化，也會產生不同的認知。

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非常特別，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，就是所謂「七七級」，考到北京唸研究生，也幾乎是博士研究生招生的最初試驗品。之前有過試驗的一屆，我們實際上是正式恢復博士制度的最早一批人。整個中國社科院那一屆只招了二十二個博士生，再加上一位上一屆尚未畢業的博士生，共計二十三人。社科院有三十多個研究所，平均每個研究所招了不到一個人，那個時候的博士生在全國範圍內少之又少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們這二十多個人，屬於完全不同的專業，卻都住在一起，所以除了文學研究的早期訓練之外，我自己回顧，我後來捲入過很多思想爭論，跟我在研究生院的經歷有一定關係。我們這個班二十多個人，其中大約有一半是研究經濟的，不同的經濟：工業經濟、宏觀經濟、微觀經濟、西方經濟理論、中國經濟理論、數量經濟和經濟史，他們後來都是在中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或者經濟領域的重要領導者。

在我們班上，在1980年代就已經有大量的爭論，幾乎是90年代更大規模辯論的預演。我們這個班的老師也比較特別，我這一代學生，有一個很特別的幸運，就是文革結束之後，老一代學者恢復工作，他們對於授課和培養學生投入極大的熱情。這是他們最後的學術階段。我的碩士、博士導師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，也就是說我是跟我爺爺這一輩的學者——也就是在五卅時期及其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——學習，不是跟我父親這一輩的學者學習。這一點我事後覺得很重要，蠻特別的。在我們班的老師裏面，有我的博士導師唐弢先生，宗教學導師是任繼愈先生（1916-2009）、王明先生（1911-1992），研究佛教和道教，經濟學有于光遠先生（1915-2013）、馬洪先生（1920-2007）、朱紹文先生（1915-2011），中國經濟史有彭澤益先生（1916-1994）、李文治先生（1909-2000），政治學方面有蘇紹智先生（1923-2019），國際關係有宦鄉先生（1910-1989），人類學有費孝通先生（1910-2005），哲學有賀麟先生（1902-1992）、楊一之先生（1912-1989），等等。

賀麟先生當年已經八十多歲了，大家都知道賀麟是1940年代新生活運動和新儒家運動中的風雲人物，曾是蔣介石的座上賓，也是黑格爾（Georg W. F. Hegel）研究中最早翻譯《小邏輯》（*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*）的最重要的一位譯者。楊一之先生後來翻譯《大邏輯》（*Wissenschaft der Logik*）。我們這個班的老師裏最年輕的有兩位，一位是李澤厚先生（1930-2021），一位是稍長的蘇紹智先生，他們兩位那個時候大概五十多歲、將近六十歲，是所有首批博士生導師當中最年輕的。當時全國博士生導師非常少，只有這些最資深的學者才有資格擔任。我的同學有的已經比較年長，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，我覺得我在追隨老師學習的同時，也從我的同學那裏學到很多，同學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了解特別重要，這一點我至今也常和我的學生說起。

1990年代以後，我捲入了許多思想上和社會問題的爭論，跟這個時期的互相碰撞有關係。回過頭來看這個事情，很多思想是走在變遷前面的，後來的爭論被放大，成為真實的社會問題，但事實上這些問題在我們班級內部的討論、爭論裏已經開始浮現了。年輕的時候最大的好處，是敢於去爭論，敢於說出自己不同的意見，這是非常重要的，為甚麼？年輕的時候持有不同觀點沒關係，不會影響友誼，有時候反而從爭論中相互理解；但年紀大了，一爭論就都不同了，然後就變成不同派別，彼此不見面，各自網羅一批追隨者，變成「封建主義」。我常常說這是學術界的封建性，這裏一圈，那裏一圈，難以打破。我覺得年輕的時候有過這樣很緊密的關係，但同時又能夠爭論，互相了解各自的觀點，會對很多問題的深化討論有幫助，而且對未來的學術道路有幫助。我很親近同學和朋友未必是觀點完全一致的人。你怎麼去理解跟你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觀點，它們的來龍去脈，你怎麼判斷？這個經驗對學術思考是很重要的。

三 山鄉鉅變中的中國

我在1988年寫完了關於魯迅的著作，就開始思考下一步做甚麼研究。研究魯迅，不可能不研究五四；研究五四，就不可能不研究晚清；研究晚清，就不能不研究清朝初期、中期，明朝或者宋朝。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有它的獨特性，比如你要研究魯迅，也要研究他老師章太炎，章太炎是個小學家、經學家，你不去做這些研究，你就讀不懂魯迅的書，你要讀這些書，就不能光停留在他的時代，所以既需要有橫向的關係，也要有縱向的關係，我是沿着這樣的一個思路慢慢地轉向了後來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》的寫作^③。1980年代末我就開始往這個方向轉，但1989年中國發生特別大的事情，不光是中國發生，全世界都發生了，所謂的冷戰終結，那是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到來的開端。但是那個時候我們能不能理解這個變化，怎麼去理解這個變遷的深度？迄今為止，是不是真正地理解了這次變遷的深度依然是不清晰的。對歷史有時作過於直接的判斷會有問題，當然行動者需要立刻判斷，但學者既需要行動，也需要有一點歷史感去感知它。我自己當然也受到波及。在1990年，我在中國最窮困的地方之一——陝西商洛生活過大半年，這段經歷在我的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我在揚州長大，對於工廠和農村的這些事都很熟悉，但是我沒有經歷過中國最貧困地區的貧窮。商洛地區比陝北還要貧窮，它在陝南。我調查過一個村莊，如果靠他們自足的生產，一年人均大概只有13斤糧食，能維持一個星期的口糧就不錯了，所以這裏需要大量的救濟。另外，農村當時正值人民公社解體之後，社會高度失序、犯罪率極高的一個時期，那樣的一個鄉村社會的圖景给了我極大的震動。我自己調查過一個村莊因地界糾紛而發生的家

族間的械鬥案，對鄉村秩序的解體有很深的體會。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跟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變化是有關的，所以理解中國政治，如果只是從外面看，只是看北京、上海，或者廣州、深圳，是不太看得清楚的，只能看到一部分，當然這一部分非常重要。但我在陝西的經歷讓我覺得，我們這些在北京、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對中國社會有多少真實的認知，是個嚴重的問題。這是自我反思的開始。我發現，在北京想的那些事，跟到了那個地方碰到的問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能夠幫助我的，像魯迅的思想，依舊能提供幫助；讀一些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調查也有幫助；讀一些梁漱溟或者是其他人的研究也能有幫助。你會去思考這個問題，但情況已經十分不同：首先要有一個直觀的社會經驗，從事一定的調查研究，我覺得這非常重要。

隔了將近三十年，2019年我重返這個地方，當時商洛五個縣還都是深度貧困縣，還沒有「摘帽」，因為全國「摘帽」要到2020年，但即便是深度貧困縣，我所見的這五個縣，尤其是我曾經待過的山陽縣，它們的變化讓我震撼不已，甚至比我當時經歷的貧窮還要令我震撼。這一點也是很真實的。我在商洛的時候，那種貧窮的程度，可以舉一個例子：海拔1,800米以上的村莊基本上沒有交通，我們送救濟糧都非常困難。由於沒有交通，因此存在大量的近親婚姻，很多村我們叫做「瓜瓜村」，許多村民都有精神類的殘疾，都是由於近親繁殖造成的；很多犯罪也跟這有關係，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、非常嚴酷的一個事實。另外，按說大山生態很好，事實上只要有公路，你已經很少能看到大片覆蓋的森林，水土流失非常嚴重，一場大暴雨可以把很多東西都沖毀。我去之前三年，一場暴雨沖毀了水渠，沖毀了小學；我去的時候，已經是三年過後，都還沒有恢復，就要跟農民一起去修水渠、修學校。這個時候土地已經分掉了，我們都知道中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；修水渠、修學校要從山上採石，但山也分掉了，那誰去勞動？石頭可不可以採？這樣非常實際的問題，在農村的組織當中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和一位當地幹部下鄉調查解決問題，也叫搞「社會主義教育」，簡稱「社教」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才知道在農民那裏，「社教」意味着甚麼：動員農民參加集體勞動，允許其他農民在已經分配的山上採石修渠，反對賭博，不准打老婆，禁止賭博，等等。這些水渠和學校都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建成的，但是那時候已經沒有人民公社，所以我們要去跟農民開會，討論這些問題，解說這些問題，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教育。我年輕的時候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過程。

我在山陽縣期間，即便是在縣政府裏，只遇到過一個大學生，西北大學的，他是陝西人，畢業以後回去在宣傳部工作，是唯一的大學生。有一所中學建在河邊，2019年我回去的時候，那條河已經修得很漂亮了。當年我在的時候，就在那期間上游建了一個造紙廠，把整條河都污染了，現在那裏都變成棧道，晚上沿河的燈火非常美。當年山陽縣只有一條小街，實際的人口大概就一兩萬，現在有十幾萬人，是一個真正的城市。我去那所中學看了看，校舍變化很大，整個縣城已經改頭換面，只有縣政府還基本是老樣子。後來

有一個副縣長，我在那裏認識的，他到北京來出差，我請他在北京吃飯，我就問他，上次去因為時間太匆忙，沒有進去這個學校，想了解一下實際的扶貧成果，因為扶貧最困難的是教育。副縣長當時就掏出手機說：汪老師你有時間嗎，我打電話讓我們的學生來看你，我們今年有四個學生考取你們清華大學。這個震撼不是一般的震撼，大家知道在中國內地，本科錄取清華之難，竟然這個貧困地區會有如此巨大的一個變化。三十年時間，依舊是深度貧困縣，但這五個縣全部都有高速公路連通，另外還有兩條鐵路連通，已經建成一條，另外一條在興建。

四 認識中國也要「看地底下」

我從陝西回到北京，正好德國有一位部長到北京，德國大使給我打電話，說部長想跟我談談，見一面。我去了，部長跟我聊了中國跟德國的差別，他知道中國發展很快，但也表示問題很多。他說的都是事實，中國的確問題很多，但是因為我剛從陝西回來，我就把陝西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的對比跟他講了一下，我說那你覺得發展要慢還是要快？那些村莊有那麼多精神類的殘疾，現在算不算人權方面的改變？我說認識中國，如果不從這些最基礎的角度去思考的話，有時候有一些問題你看不清。

去陝西之前，經歷了巨大的動盪，也有被調查的過程，官方的說法是「了解國情」，但我們自己有種被發配的感覺。可是那個過程，實事求是地說，對我確實有教育意義。我在陝西的時候給《讀書》雜誌寫了一篇短文，沒有用我的真名，講如何看鄉村問題。我後來擔任《讀書》主編的時候，曾經發表過一組照片，關於麥客的作品。大家知道甚麼是麥客嗎？西北割麥子的農民，他們要沿着路線到不同的地方去幫人割麥子，像候鳥一樣到處奔波，古代就有，延續至當代。有一個在陝西臨潼火車站工作的人，後來成為很有名的攝影師，叫侯登科（1950-2003）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，非常震驚，就在《讀書》組織了一次討論。大家知道《讀書》開本比較小，一般來說不刊登圖片，但是那一次破例發了圖片，完全是麥客的圖片。為甚麼當時我做這個決定呢？因為侯登科是臨潼火車站的一個普通員工，他跟隨着麥客去拍照片，基本上就是從1989年開始的。我當時就覺得，1989年侯登科的世界和我們這些人的世界是不一樣的，侯登科一定知道我們的世界，可是我們不知道他的世界。

文學的想像力和思想的想像力有多大，一定程度上基於你能不能夠去發現這些你不知道的世界。不僅如此，還取決於你能不能從另一個世界的眼光，比如侯登科鏡頭下的麥客的眼光，打量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。在大學裏，尤其是在名牌大學裏，我們的眼睛都往上看，往西方看，基本上是這樣。魯迅說，認識中國要到地底下——他說過這句話：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。」^④我以前老想甚麼叫地底下呢？我怎麼到地底下看？這是去見鬼了嗎？其實是要從

地底下的眼光觀察上面的構造和運動。我在2023年發表過一篇文章，說鬼眼實際上是很重要的，看世界需要有點鬼眼，我們做不了上帝，但是有一點鬼眼很重要——對於思考，對於想像，甚至對於文字的表達，可能都有一些意義，這就是所謂「鬼眼」的意思^⑤。鬼是甚麼？鬼超越時間，超越空間，有各種各樣的附體，像魯迅寫〈女吊〉一樣，以那樣的一個緊迫不捨的視角去理解一些問題。對我來說，這些經歷其實還是很淺的，但是我在這裏不想分享那麼多高頭講章，而只想說一點，可能是我這一代人的一點獨特的經驗。我過去不太意識到這個獨特性。記得有一年我在日本和有名的魯迅研究者丸尾常喜先生(1937-2008)聊天，他現在也去世了，他寫過阿Q與鬼的問題。有一次學術活動過後，我們一起乘地鐵離開時，他跟我說，看你們很不幸，但其實也很幸運，因為在日本已經不會有一個學者有這麼多的經歷了。

五 中國鉅變的全球意義

之後我當然又有別的經歷，和麥客差不多，只是空間範圍和工作不同了。我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常常開玩笑，高研所的所有同事都有留學背景，都是海歸，只有我是土鱉。我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，留在中國社科院工作。我1992年去了美國，先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，後來又去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博士後研究，但我覺得我不太想留下來唸博士，我已經有一個博士學位，不太想再唸一個，而且我不想留在美國，想回到中國。在哈佛和加州，以及後來在芝加哥，我也有一些機會與來自不同國家和學術領域的學者交流，那時西方學術界尤其關注蘇聯解體後的東歐轉軌，所謂轉軌經濟學、轉軌政治學也正是一時之浪潮。中國不僅被許多國外觀察者忽略，也被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所輕視。但我在1989至1992年的經歷已經告訴我，中國一定是這個世界上發生最特別的鉅變的地方，值得去觀察和思考。在1990年代我就有一個基本的判斷，認為中國的變化會對整個世界帶來巨大的影響，而且相當多的問題可能在美國已經找不到答案，雖然你可能會需要體驗美國，就像大家學習美國的語言、學術研究方式等等，但是美國不太可能給你一個直接的答案，需要回到中國直接去觀察鉅變，這個鉅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，包括它的規模、複雜性、影響、波及的範圍等等，所以要立足中國做研究。

記得在1993年10月回國之前，有位在加州的朋友給我電話，問我對美國學術界和理論界的觀感，我說：美國學術界、理論界很活躍，但對於世界變局的理解，恐怕不會有甚麼重大的答案。那時流行「歷史終結論」，雖然有些爭論，但連同這些爭論本身也只能說明：他們需要等待，等待世界其他地區——如今看來，尤其是中國——的鉅變才能開啟新一輪的思考。那以後當然我又到過很多地方，可是每一次都還是以中國作為我的根據地，以我自

已持續追究的問題為主軸，不管在外經歷如何，也不管如何接觸和學習各種知識和理論，我一直投入這個浪潮裏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索來回應時代性的課題。

1980年代一個大的浪潮，總體來說就是開放。事實上，開放也就是向西方開放，大家的眼睛都是看着美國，看着歐洲或者日本，所以開放的有限性需要一個過程才能理解。我決定寫現代中國思想興起的過程，其實在80年代末就開始了，從90年代初已經陸續發表，前後寫了大概十三四年，我覺得算是很用功，差不多夜以繼日。我在社科院工作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教書，早晨起來就是思考這些問題，晚上睡下去還是思考這些問題，基本上十幾年就是這樣，所以我雖然在這期間經歷了社會的變遷，捲入了許多重大的爭論，但是回到家之後，始終是處在讀書、研究和寫作的狀態。為甚麼有這麼大動力去做這件事？一個人要投身一件事情，十幾年如一日地工作，這要有一點激情。我感覺80年代到90年代的轉變跟中國歷史之間的關係，是我們在80年代氛圍中成長的人所不能夠完全理解的。如果你只是看美國看歐洲，就想說清楚這個轉變，我認為不可能，我愈研究愈覺得不可能，你依舊需要找到自己的切入點和歷史的脈絡，你需要理解自己跟歷史的關係，一定程度上這也塑造了我自己的認同。

我作為一個中國學者，到底應該怎麼去看這個世界？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》的寫作就持續了這麼長時間，從1991年第一次發表書中的一個章節，到2004年這部書出版。事實上，這部著作的結尾是開放的，或者是未完的，我後來所做的研究依舊在回答那些問題。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，我們都是用手寫，後來有了電腦，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系統，更沒有現在的互聯網，而且以中文輸入，很多字都是沒有的，繁體字也沒有。我經常在不同的地方做研究，找資料很困難，常常背着沉重的圖書資料旅行，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了工作。我一邊完成這項工作，一邊對當代世界和中國的變化進行思考。我寫了一些（其實不多）關於當代問題的文章，但又變成了爭論的焦點。再加上1996年，我應邀擔任《讀書》雜誌的主編，《讀書》在中國又如此特別，所以它迅速地成為另外一個聚焦點。1996年開始，我有超過十一年的時間擔任《讀書》的主編，完全不同的視野、觀點和討論都集中在這個雜誌上。當時知識界討論中最重要的問題——圍繞中國和世界最核心的問題，可能《讀書》是最重要的提出者。我那個時候與境外的學者接觸比較多，把世界各個地區如日本、歐美學者引入到《讀書》去做討論，包括德里達（Jacques Derrida）、哈貝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、詹明信（Fredric Jameson）、安德森（Perry Anderson）、溝口雄三等等，太多了。他們後來就養成了一個習慣，一到中國，就想到《讀書》來座談，這是一個獨特的氛圍，也形成了我編輯《讀書》時的一些思想。香港、台灣的許多學者也成為了《讀書》的作者。

我覺得這種不斷被激活的狀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，同時，找到一個重點研究的問題也很重要，所以我基本上回到家就在做我的思想史研究。我在

研究中，以問題為中心，常常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去閱讀通常不在一般思想史研究範圍的著作。這樣的工作方式一直延續到二十多年前，我在德國的時候，清華大學希望我能加入，幾位朋友來勸我，我當時跟清華說，我對教書沒興趣，我已經習慣了，不想教書了，你們能不能成立一個高等研究院？我當時正在柏林高等研究院 (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) 擔任研究員。我後來想這是多麼幼稚的一件事，建立這樣一個機構，需要多少資源、多少力量，但我到清華以後也沒有放棄這個理想。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，我們在經過一個短暫的實驗階段之後，於2009年成立了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，這又是一項跨學科的工作。

從建立高研所開始，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宗旨，即跨學科、跨文化、跨區域。起初因為規模很小，我們設立了一個項目，叫做「民族/宗教/社會/國家：跨學科、跨文化研究項目」，其中包含所有範疇，但是實際上有所側重，因為民族問題在中國很重要，2008年西藏出現問題，2009年新疆出現問題；廣義地說，各個地區甚至港台所發生的問題，一定程度上都跟民族問題有關。宗教問題在民族問題裏面，又是非常獨特的問題。這些問題不是孤立的問題，與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法律、文化都有關聯；這些問題也不是孤立的中國問題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，所以確實需要完全不同層面的觀察。現在高研所有一個水木計劃專項，每年在全球招聘博士後研究員，他們會在所裏進行三年的博士後研究，再加上每年邀請到高研所的重要學者，已經形成了一個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平台。

回頭來看這些過程，有許多偶然的機緣巧合，但也與我的學術經歷有些關係，所以拉雜講來，供各位參考。至於具體的學術研究工作及其學術史脈絡，或許以後有機會再做討論。

註釋

① 汪暉：〈重影〉，《今天》，2012年秋季號，後收錄於《顛倒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3-30。

② 汪暉：《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——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25）。

③ 汪暉：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》，共四卷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4年初版；2008年第二版；2015年十周年紀念版；2019年第四版；2024年二十周年版）。

④ 參見魯迅：〈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〉，載《魯迅全集》，第六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122。

⑤ 汪暉：〈歷史幽靈學與現代中國的上古史——古史/故事新辨（下）〉，《文史哲》，2023年第2期，第八節「歷史幽靈學：鬼眼與無名者的追問」，頁13-20。